

中西對話
汪琪 主編

邁向第二代 本土研究

社會科學本土化的
轉機與危機

汪琪 著



中西對話
汪琪 主編

邁向第二代 本土研究

社會科學本土化的
轉機與危機

汪琪 著



中西對話

邁向第二代本土研究

社會科學本土化的轉機與危機

作者：汪琪

叢書主編：汪琪

發行人：王春申

副總編輯：沈昭明

編輯部經理：葉囀英

責任編輯：徐平

封面設計：吳郁婷

校對：趙蓓芬

出版發行：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10046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電話：(02)2371-3712 傳真：(02)2371-0274

讀者服務專線：0800056196

郵撥：0000165-1

E-mail：ecptw@cptw.com.tw

網路書店網址：www.cptw.com.tw

網路書店臉書：facebook.com.tw/ecptwdoing

臉書：facebook.com.tw/ecptw

部落格：blog.yam.com/ecptw

局版北市業字第 993 號

初版一刷：2014 年 10 月

定價：新台幣 360 元



ISBN 978-957-05-2961-5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中西對話叢書序

清末民初的百年間西學東漸，中國的思想與學術在一場驚天動地的典範轉變後，逐漸陷入一個歷史學家余英時所謂的「雙重邊緣化」困境。在理論知識上忠實追隨西方，不僅使我們在國際學術版圖上淪為邊緣，研究對本土社會文化發展的貢獻也頗為有限。華人社會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上年復一年投入龐大人力與資源，但我們是否真正瞭解「全球化」與「本土化」的意義？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我們如何看待自己、看待西方、重建「主體性」，又如何的學術上與西方對話？

許多人急於提出「本土理論」，然而理論知識的產生必須由更根本處著手。無論是對西方論述的回應、由現代學術的觀點詮釋傳統、檢視中西思想交流，或直接面對本土學術議題，系列叢書的目的都在以一種較「本土化」視野更為寬廣的思維，來推展本土學術可長可久的發展。

導讀

肖小穗（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教授）

過去三十年間，港台和大陸有關「社會科學本土化」的討論此起彼伏，文章寫了很多，研討會、對話會、座談會等開了不少，會議後的論文彙編也出過若干本。在傳播研究方面，最近的有汪琪編著的英文專集《傳播研究去西方化》（Wang, De-Westernizing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ltering questions and changing frameworks, 2011）、馮應謙、黃懿慧合編的《華人傳播想像》（2012），以及黃旦、沈國麟合編的《理論與經驗——中國傳播研究的問題及路徑》（2013）。但獨家發表的專著，目前還只有汪琪的這本《邁向第二代本土研究》。行內早在打聽這部書的「產期」，不久前《傳播與社會學刊》邀請汪琪參加了一場「學術對談」，談的就是她對目前傳播研究本土化的看法（汪，2014）。作為學刊一方的對談人，我捷足先讀了這部書稿，對談時更是近水樓台，提出了一些問題，得到汪琪的解答，受益菲淺。所以我很願意為這部新作寫些什麼，雖然自付沒有評價它的資格，但還是願意分享我的點滴心得，希望能起點「導讀」的作用。其實在介紹這次「學術對談」的「卷首語」（肖，2014）中，我已多少寫下了一些感受，但意猶未足，現在正好把我當時未來得及說的話補上。

要理解汪琪的這部新作，得從她本人的履歷說起。汪琪有學貫中西的寶貴經歷：出身

於外交官世家，早年在海外耳濡目染；在美國攻取博士之後，先在美國東西文化中心從事研究，後返台灣執教，並致力於本土研究；在台灣、香港等地擔任傳播學講座教授和院長期間，更積極推動本土與國際的學術交流。這一特殊經歷讓汪琪的本土化見解具有一種恢宏的國際視野。值得一提的還有汪琪長期主持「本土化研究」的資歷。早在一九九八年，汪琪就已啟動其「本土化研究」的大計，開辦過數次工作坊。由香港回台北後，曾主持一個「頂尖大學研究計畫」，主攻傳播研究的本土化，為此她舉辦過國際學術會議，會議論文後來彙編成上述的英文專著（*DeWesternizing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11）和「本期刊專輯」（*Asi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ferment*, 2009），分別由勞特利其出版社（Routledge）和《亞洲傳播期刊》（*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出版。之後，汪琪又開啟一個「中西對話叢書」的計畫。新的研究經歷再次拓展了汪琪的視野，她於是重新檢討第一代學者的本土化論述，這次檢討造就了她的這部新著——《邁向第二代本土研究》。

從書名看出，這部《邁向第二代本土研究》的起點較高，一開始就從一個高度上來檢視過去的本土化觀點。這一高度自然與汪琪長期主持本土研究的資歷相關，但是話說回來，僅僅是「資歷」和「輩份」不足以解釋這部專著的思想高度，「資歷」和「輩份」並不決定汪琪必然要「邁入第二代本土研究」。汪琪的「第二代」觀點與其說是反映了學界的主流意見，不如說是來自她個人的深刻反思和批評意識。

的確，這部專著比現有的許多本土化論述站得更高，也走得更遠。她所追求的本土

化「不只在於回歸本土、也在走出本土」(第二五九頁)。在她看來，七〇年代以來港台大陸學界發起的「本土化」運動看似一路高歌猛進，但實際上已經進入了某個瓶頸。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令人焦慮的，是不但『本土化』概念摻雜了許多似是而非的說法，學界對於本土學術發展也呈現兩極化傾向：或是追隨主流、或是專注本土」(2014, 頁4)。這一問題反映出學界並不真正瞭解「本土化」的目的，因此不清楚應該如何實現「本土化」。汪琪認為「本土化」的最終目的是提出自己的看法，與國際主流對話(2014, 頁9-11)。

回歸本土不難，走出本土也不難——早在上世紀二〇年代的科玄論戰中打得不可開交的「玄學派」和「科學派」就已經分別這樣做了；難的是兩者結合。在我看來，汪琪的心始終是向著本土的，言語間處處流露出對本土的強烈關照。據汪琪自己說，她早年的幾本著作「都是在凸顯媒體的文化特色、『在地』觀點或經驗」(2014, 頁4)。這次回首過去，其用意也是要「邁入」第二代本土研究。正是因為有她「立足本土」之情深，才有她「走出本土」，「與主流對話」之適切。

汪琪清楚地意識到，「只是凸顯本土經驗是不夠的，因為本土學術發展最終無法迴避理論層級的討論與對話」。為此她建議我們走出「本土／國際」二分的思維模式，而要這樣做，首先是要小心使用「本土化」這一概念，原因是它「摻雜了許多似是而非的說法」，其中包括了本土「在地化」、「典型化」、「本質化」、「中國化」、「港台化」等片面的說

法（2014，頁2—10）。更有甚者，這個「化」有演化成狹隘的本土主義的危險，汪琪相信狹隘的本土主義沒有出路，只會把本土研究引向一種極端的做法，或是「專注本土」，或是「追隨『西方』主流」。不幸的是，她看到這種二極化的危險正在成為現實，許多華人學者都在忙著經營自己的一小塊「本土」，結果是沒有「整合性的整理與分析」、「欠缺理論論述」、「不事經營學術主張」、「對於研究問題與觀察角度欠缺自主性」、「被動地『套用』或『照搬』現成理論」，最後事與願違，「華人學者基本上都仍然是在複製西方的理論論述」（頁22—38）。

「邁入第二代本土研究」，意味著學者要進入一個新的問題區域。對我來說，這部新著最有價值的地方還不在於它給出的答案，而在於它引發我們去思考的許多問題。譬如，「本土文化」是否可以還原為某種「本質」？是否有必要區分「本土」與「非本土」研究？紮根於「本土」的研究是否就是「本土研究」？我們是否有評判「本土」的客觀準則？本土化是否應該牽扯上族群情結？研究傳統的觀念和方法是否就是本土研究？如何避免西方視角和西化立場？……這些問題是沖著目前本土研究的本體論、認識論、價值論和方法論來的，所以不是一般的問題。我們不一定認同所有這些問題，但不能不承認它們是彼此牽連、共同進退的。若分開來看，這些問題可能不是什麼新問題，我們也許在某些場合討論過它們。但綜合來看，它們反映了一種新思維，新在它們超越了本土／外來二分的思維模式，也就是說，它們是在一個新的、開放的思維框架下提出來的。不錯，我們仍然可以堅持舊的本

土化思路，並從這一思路上來回答上述問題，但不可否認，這些問題的提出本身已經開放了從另外一個思路上來回答的可能性。新一代的本土學者不是非要在汪琪的問題框架下思考和工作，但起碼要回應汪琪的問題，並要嘗試給出合理的說法。

新一代本土學者要走出本土，與國際學術對話，但在走向對話的路上，他們還必然要遭遇來自「特殊／普世」二分模式的阻礙。汪琪還必須處理好這個二分模式，否則對話會演變出另外一種二極化傾向：或是各說各話（專注本土），或是套用西方的理論論述（追隨主流）。有趣的是，汪琪採取了另外一種處理方法，在「本土」還是「國際」的問題上，汪琪的做法是「走出本土」；而在本土「特殊性」還是西方「普世性」的問題上，她卻選擇把西方拉回到它的「本土」原點，「西方不過是另一個『本土』（頁30）。既然西方不代表『普世』，對話也就沒有必要套用西方的論述。」

但與此同時，為了避免各方學者各說各話，汪琪「必須尋找一條『異』中可以求『同』的途徑」，她於是主張用「可共量性」概念取代「普世性」（2014，頁7）。「可共量性／不可共量性」（commensurability/incommensurability）源自孔恩（Thomas Samuel Kuhn）的「科學革命」理論。之所以要說「革命」，是因為孔恩認為新的科學典範不可能從舊的典範內部自發產生出來，新舊典範使用不同的語彙，彼此無法對譯和互通。孔恩說它們「不可共量」，意謂它們是不可比較的。但因為「不可共量」的說法無法解釋在不同典範下工作的科學家仍然可以溝通的事實，孔恩在晚年修正了原先的一些說法，在他看來，「不可翻譯」的語彙

不一定就「不可詮釋」，因此在不同典範下工作的人們仍然可以借助「詮釋」來達至相互的理解（Kuhn, Conant & Haugeland, 2000, pp. 36-38）。這一修正開放了一種可能性：「不可共量」的語彙或概念經由適當的「詮釋」之後是「可以共量的」。「可共量性」概念於是被汪琪用來說明本土學術在國際間與其他本土學術對話的可能性。這個「可共量」而不是「普世性」的選擇再一次顯示了汪琪的本土傾向，對她來說，「『可共量』有一個『普世性』所沒有的關鍵性優點，就是它所要求的是『相似』或『對等』、而非絕對的『相同』……因為只是『雷同』，『特殊性』就保有了了一個合理的存在空間」（2014，頁8）。

由此看來，在汪琪的本土化論述架構裡「詮釋」（interpretation）最後承擔了促進學術對話的重托，它甚至承載了本土研究發展的希望，它因此必須是一個複雜的過程。這樣一個論述架構決定了這裡說的「詮釋」既不同於「翻譯」（translation），也有別於一般人所理解的「詮釋」。它需要處理好「不可翻譯性」與「可共量性」的關係，前者解釋了本土學術的「特殊性」，後者則解釋了它由「特殊」走向「共通」的可能性。因為這樣，它至少要分兩步走，即「由『普世』到『特殊』、再由『特殊』到『可共量性』」（頁214）。從另一角度來說，詮釋意味著詮釋者不能滿足於尋求意思相等或相近的語彙，他還要「進入概念與命題的歷史脈絡」（頁212）。如何進入？汪琪提供了以下方法，它包括兩個重要步驟：

首先，要擴大文獻探討（literature review）所參考的範圍。不但包括相關理論過去的討論，也包括這些理論的思想根源與歷史文化背景，同時找出所有本土文獻中足以連結「本土」

與「外來」觀點與關懷重點的論述。其次，由於這些本土觀點、思想與關懷重點未必是以現代所謂「科學語言」所書寫，甚且也不合乎社會科學的論述原則，因此在分析比較「外來」與「本土」的「異」、「同」及其理論上的意義之前，必須經過「詮釋」與「翻譯」，將其轉化成為得以與「外來」論述對話的語言（頁251—252）。

汪琪在最後一章（第六章）還提供了一個具體實施這一方法的分析案例。我個人認為，「進入概念與命題的歷史脈絡」是必須的，但在具體的操作上，我們可以不拘一格，我們可以有各種進入「歷史脈絡」去尋求「特殊性」和「可共量性」的途徑。就是在以上方法的框架之下，我們也還可以選擇不同的做法。思想史家如張灝、墨子刻、史華慈等已開發出一些具體進入「中國歷史脈絡」的路徑，譬如從當事人的思想環境和生存情境進入（如張灝，2006），或者從儒學傳統的「共同語法」入手（如墨子刻，1996），又或者從中國文化的問題意識（*Problematics*）出發（如史華慈，見林同奇，2002），這些路徑各自代表了一種處理和分析歷史文獻的方法。學者在尋求進入歷史文獻的同時，也在尋求一種理解和對話的方式。本土的傳播學者可以參考這些方法和途徑。但無論是何種方法和途徑，它們都將見證這一過程是汪琪所說的「一個批判／吸納、對抗／融合、破壞／建立的過程」（頁212）。

在我看來，本書有兩個道德亮點，讓這本視野高遠的專論不會顯得高不勝寒。首先是對文化間對話的冀望。把跨文化對話看作是「本土化」或發展本土學術的最終目的，是汪琪個人的理解和願景，本土學者不一定都這樣想，這不一定就是他們發起「本土化」運動

的初衷。但我認為這是汪琪的灼識，它展示了一種國際視野，也為「本土化」或本土學術發展安排了一個美好去處，「本土化」不是閉門造車，自說自話，這畢竟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不管從哪個意義上來理解它）。其次是汪琪對中國文化的深刻反思。她在第二、第三章指出目前「本土化」的許多問題（譬如欠缺自主性）都可以追根求源到華人文化的治學傳統、教育體制、或學術政策，她的意思是要本土學者更多地思考中華文化自身的問題。對她來說：「今天華人學術發展所面對的也絕不只是一個學術帝國主義的問題，而是學術典範、教育體制與政策問題，更是歷史文化問題——是一個關乎整體、而非只是「本土」或非西方學界的問題。文化是關鍵、也是所有上述因素背後的根源；它不是一個冰冷遙遠的研究題材，也是研究的本身」（自序）。反思自己的文化不應該是問題，中國文化不是也講究反求諸己嗎，所以這一要求不過份，起碼在道德上說得過去。

我個人認為，汪琪在書中提出了一個理論架構，這是一個完整的架構，每個部份都經過仔細的斟酌和推敲，而部份與部份之間則由若干重要的文化價值理念鉅接在一起。任何理論架構都需要某些價值理念從中穿針引線，所以不是問題。我倒認為汪琪對跨文化對話的熱切關照和她強烈的反思意識，正好凸顯出她的本土化論述的主要特色。

參考文獻

- 1 Kuhn, T. S., Conant, J., & Haugeland, J. (Eds.) (2000). *The road since structure : philosophical essays, 1970-1993, with an autobiographical interview*.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2 Wang, G. (Ed.) (2011). *De-Westernizing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hanging questions and altering frameworks*. London: Routledge.
- 3 Wang, G. (Ed.) (2009). Special issue: Asi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ferment – Moving beyond Eurocentrism.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 (4).
- 4 馮應謙、黃懿慧編 (2012)：《華人傳播想像》，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 5 黃旦、沈國麟編 (2013)：《理論與經驗——中國傳播研究的問題及路徑》，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 6 林同奇 (2002)：〈他為我們留下了什麼：史華慈史學思想初探〉，《世界史學》，第二期，頁 38—66。
- 7 汪琪 (2014)：〈本土傳播研究的下一步〉，《傳播與社會學刊》，第二十九期，頁 1—15。
- 8 肖小穗 (2014)：〈走出簡單的二分模式〉，《傳播與社會學刊》，第二十九期，頁 v—x。
- 9 墨子刻 (1996)：《擺脫困境——新儒學與中國政治文化的演進》(*Escape from predicament: Neo-Confucianism and China's evolving political culture*)。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 10 張灝 (2006)：《危機中的中國知識份子：尋求秩序與意義》(*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crisis: Search for order and meaning, 1890-1911*) (高力克、王躍譯)，北京：新星出版社。

序

或許是自己的生長環境與經歷，文化議題始終讓我著迷；但是會把文化差異帶進學術研究本身來看「本土化」，卻是經年累月在「問」、「被問」、「反問」與我所得、以及沒有得到的答案之間發酵、沉澱而來的。

十多年前，在巴黎一次以全球化為題的演講結束後，一位白髮蒼蒼的教授來問：「為什麼妳不講『你（們）的』理論？」面對這樣一個從未想過的問題，我只能回說：「全球化理論就是這樣」；「但東方有很深刻的思想傳統」，他顯然不滿意我的答覆，說完轉身離去。又一次和一位被我認為是「狂熱馬克思主義者」、「思想不轉彎」的朋友閒聊，無意間說出自己的疑惑：「為什麼新舊馬克思主義論述總把自由主義經濟與文化視為對立的兩個極端？」本以為這問題會觸發對方熱辣的反駁，不料這位德國學者竟回說：「有道理；問得好！」這答覆同樣讓我出乎意表。巴黎老教授的問題讓我開始思索「我」、和「我的文化傳統」與我所瞭解的理論之間的關聯；而終生以馬克思研究為職志的老友，則讓我不得不認真面對「理論未必有效」、以及「所以又怎樣」的問題。

問題引導思考，但有時沒有問題，也同樣逼人思考。一段時日後，我觀察到這類對答

不常在本土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界出現——這又是為什麼？問到理論，我當年給法國老教授的答覆：「人家理論就是這樣」是常見的回應；也有更熱心的學者建議：「先回去把它弄懂再問。」但就只有「沒弄懂」才會有問題嗎？在西方的思辯傳統，問題是科學發現與知識建構的起點。常常是：有問題就沒問題、沒問題倒會有問題。或說華人不習慣發問與質疑，但重「體悟」與「轉化」。問題是，我們的研究中展現了多少體悟的淬鍊與轉化的智慧？如果我們覺得不應該安於本土學術的現狀，未來的路又要怎麼走？

對於許多學者，「本土化」是問題的答案；它也是一個學術自主的問題。「主體性」淪喪所造成的現象令人不安，由這個角度切入本土化議題十分自然。但是本土化概念有其含混之處；對我而言，今天華人學術發展所面對的也絕不只是一個學術帝國主義的問題，而是學術典範、教育體制與政策問題，更是歷史文化問題——是一個關乎整體、而非只是「本土」或非西方學界的問題。文化是關鍵，也是所有上述因素背後的根源；它不是一個冰冷遙遠的研究題材，也是研究的本身。我們要進入西方所建構的現代學術領域，無時無刻不在面對跨文化互動所可能出現的問題。脫離文化脈絡去講「主體性」，不但很容易讓我們落入「文化中心主義」的陷阱，許多無解的問題也隨之而來。

本書是根據作者於二〇一一年編輯出版的英文著作：《傳播研究去西方：不同的問題與框架》（*De-Westernizing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ltering Frameworks and Changing Questions*）中，自己執筆的三章發展而成。這本書的付梓，也是一連串因緣際會的產物。二〇〇七年我由香港回

到台北執教，當時一個有關傳播研究本土化的「頂尖大學研究計畫」主持人出缺，給了我一個重拾此一研究議題的機會。說「重拾」，是因為一九九八年起，我已經開始了這一主題的跨學門計畫，但是在舉辦了幾次工作坊、以及初步資料蒐集之後，始終沒能在工作的轉換中，得到進一步開展的機會。二〇〇七年的「頂大計畫」提供了一個平台——兩年期間由工作坊發展出國際學術會議，會議論文再分別由《亞洲傳播期刊》(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與勞特利其出版社(Routledge)出版，至此告一段落。同一時間，國立政治大學提供的「講座研究費」，讓我得以開啟了一個頗為浪漫的「中西對話系列叢書」計畫，希望能藉由深入歷史文化脈絡去討論各學門的關鍵概念，為未來建構本土論述鋪路。然而系列專書第一、二本所得到的反應讓我了解，對大部分學界人士，「本土化」的意義、作法與牽涉的因素，還是相當陌生與模糊。困心衡慮的推敲，使我興起了撰寫本書、以及調整系列叢書方向的念頭。

由文化角度來看本土學術有助於拓展視野，但也令我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首先是「本土化」所牽涉的議題，逼使我遠遠離開了自己熟悉的傳播研究，進入許多頗為陌生的領域——包括哲學、詮釋學、甚至中東、以及南亞近代史。這其中的每一個領域都足以令人傾畢生之力去鑽研；而我只是一名過客、一名粗暴的掠奪者，貪心地各處尋找可以灌溉本土議題的活水泉源。書寫過程中的另一挑戰，是我提出的論述，是否能夠通過自己所定立的標準、達到自己期許他人的目標？每一支射向別人的箭，都有兩支對準自己。但不

論顧慮有多少，在學術的領域，態度可以謙虛，但在「表述看法」方面，需要「（野人）獻曝」的勇氣。學術思想的衍展，貴在我們檢驗別人主張的同時，別人也檢驗我們的主張——包括我們對別人主張的檢驗。在這樣的思維之下，我不揣淺陋、提出自己的看法，準備接受批評與檢驗；本書中對於第一代本土化論述的檢討與評論，也是在這樣的思維下展開的。

檢討與評論的目的不在否定或抹殺，而是對話與討論——這也是本書的目的。事實上，由人類歷史來看，無論中國、歐洲或其他文明的傳統，缺少了這一環，思想都趨向停滯。歐洲中古時期與中國在近兩千年科舉盛行時期，都出現思想的停滯現象。如果三百年前歐洲在拋棄神權時，一併拋棄了希臘傳統，則今天的歐洲會是現在我們看到的歐洲嗎？如果文藝復興讓歐洲的思想再度蓬勃發展，則華人學界何不能換個角度去審視「傳統」？西方有一句諺語：「替嬰兒洗完澡」不要把嬰兒連洗澡水一起倒掉了。」師法西方不必全盤否定自我；科舉式思考不足取，何不回到中國歷史上思想發展最蓬勃的春秋戰國時期去尋找答案？諸子學說的論述方法與取徑，難道沒有值得我們參考借鏡之處？這部分我們了解了多少？

經過近兩千年思想上的限縮與百餘年的自我否定，如今要求華人學界融合中西、啟動一次學術上的「浴火重生」，絕非易事；但若今天我們不往前走，未來將益發地舉步維艱。本土學術發展是一場接力賽；最重要的是我們有沒有把棒子丟掉、自我放棄。

本書大部分書稿是在退休之後寫就的。我謝謝兩岸四地在不同階段給我寶貴意見的學